

# 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述评

· 王 元 ·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思想对欧洲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有些人把他推崇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因为他是“提出了和面对着西方社会主义最困难的问题”的“天才”，是“给马克思主义的西欧式发展开辟了道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峰。”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作了广泛的探索，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国家问题是葛兰西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对国家的概念、职能、消亡和国家权力等国家学说的重要方面都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而他所有这些关于国家的观点乃是从“市民社会”角度阐发、推导而出的，因此，笔者认为，“市民社会”理论是葛兰西考察国家问题的出发点和核心点，故称其国家观为“市民社会”国家观。本文拟对此作一番粗浅的探析，求正于诸位同道。

## 一、国家概念：市民社会的提出与赋新

葛兰西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必然包含着原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中的一些成分（因为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sup>①</sup>在这里，葛兰西提出了其国家概念的著名公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这个公式赋予国家概念以新的内涵，它超出了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专指政治社会那种涵义的国家概念，而将市民社会的成分也纳入国家内涵。他认为，过去人们通常都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混为一谈，把国家仅仅理解为政治社会，认为国家即等同于政府，而实际上，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国家还应该包括市民社会。葛兰西由此把国家分为狭义的（片面的）国家和广义的（“完整”意义的）国家。狭义的国家概念就是专指政治社会内涵的国家，广义的国家概念则还含有市民社会的内涵。

关于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曾经说过：“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sup>②</sup>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并认为解析市民社会应求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即有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竖于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③</sup>因此，确切无疑，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归于经济基础范围。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则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能够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的’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来执行的。”<sup>④</sup>在这里，葛兰西把市民社

会主要视为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并作为国家的某些成分。无论马、恩还是葛兰西，都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理解国家的关键因素，但二者对“市民社会”内涵的不同界定就导致了对国家分析的侧重点不同。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等于经济基础，所以马、恩注重于物质生产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和国家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分析，而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则是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并作为国家的某些成分，所以他注重于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分析。

“市民社会”概念的提出并赋予其新内涵，是葛兰西国家概念的特色所在。他对国家的定义是崭新的，那就是不仅要从政治社会意义上理解国家，而且还要从市民社会角度来考察国家。葛兰西并不否认国家的阶级强制性，他也从政治角度看国家，认为国家理当包含政治社会，并认为政治社会就是“被用来把群众控制得和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专政或某个其他的强制性机器。”<sup>(5)</sup>可见，葛兰西所谓政治社会就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机器，就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统治阶级运用这些政治机器，进行强制性统治。但同时，葛兰西又超越了这一点，他更强调从市民社会角度来理解国家。前面提到，葛兰西是把“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和国家的某些成分来使用这个概念的，因此，他强调分析国家的市民社会因素，亦即强调分析作为国家重要基础的市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因素。他认为，国家的组成不仅仅包括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性工具，而且还应包括市民社会中的教会、工会、学校等各种组织和公民生活中的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也同样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坚强机构，“它们总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或文化的领导机关。”<sup>(6)</sup>

如果说以暴力统治为特征的政治社会构成国家的“硬件”，那么，以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市民社会则构成国家的“软件”。国家统治应“软硬兼施”，既需要政治机器的强制性统治，也需要利用市民社会中形成的政治统治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道德习惯等因素进行非强制性统治。葛兰西把这种统治称为“强制+同意”。他说：“国家是一种完全复杂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统治阶级不仅借此证明自己的统治合理、合法，以便维持这一统治，而且还要设法使那些受统治的人积极同意它的统治。”<sup>(7)</sup>也就是说，国家统治应把强制和同意有机结合起来，将自己强制性的政治统治（政治社会）建立在广大市民自觉服从（市民社会）的基础上。

## 二、国家职能：市民社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职能是国家本质的具体表现。葛兰西对国家职能的分析正是与其国家概念（本质）紧密相联的。与“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相对应，他认为存在着伦理的国家和政治的国家，而“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在这个意义说来，在国家中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执行积极教育职能的学校。”<sup>(8)</sup>葛兰西在此着重强调了国家的教育职能，认为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他认为，国家不仅仅充当“守夜人”角色，即国家的职能不只限于维持公共秩序和维护法律尊严，而应“努力从‘身体上’和思想意识上来扩充自己的阶级范围。……国家的作用应有所改变：国家成了‘教育者’等等。”<sup>(9)</sup>可见，葛兰西认为国家的职能不仅包括维护国家秩序和法律尊严等镇

压职能，而且还包括提高人民文化、道德水平的教育职能，换言之，就是国家的整体功能是由镇压职能和教育职能共同形成的。而教育职能正是市民社会所负担的主要功能，也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必须指出的是，葛兰西这里指的教育职能不是我们通常仅就传授知识这种狭义上的教育，而是一种广义而言的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意识形态、文化、宗教甚至日常行为等广泛领域。

传统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强调的是国家的阶级压迫职能。应当说，这是片面的，它忽略了国家的非暴力因素。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国家的职能是包括两方面的：“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sup>(10)</sup>在《法兰西内战》里，马克思把中央政府分为“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和“由于国家一般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sup>(11)</sup>这里的特殊职能和控制权威指的是国家阶级统治职能，而公共事务和一般共同需要指的是国家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的角色所承担的职能。显然，马克思注意到了国家的非暴力因素——国家的社会职能。葛兰西则从国家的“教育”职能角度也看到了国家非暴力的一面。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社会职能”和葛兰西说的“教育职能、都是由“市民社会”承担，但前者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延续，后者是作为上层建筑和国家某些成分的“市民社会”的“间接”统治职能的表现。另外，二者虽然都注意到国家的非暴力因素，但在层次上还是有差别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职能”不仅是非暴力的，而且是非政治性、非阶级性的，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管理职能；而“教育职能”虽然是非暴力的但却具有政治性、阶级性，它同样是阶级统治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非暴力的所谓“间接”统治罢了。

### 三、国家权力：市民社会的核心

葛兰西同样从“市民社会”角度对国家权力进行了透析并由此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领导权”理论。

他认为，领导权在权力结构上包括两类：一种是“文化上的领导权”，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前者是对应于市民社会而言的，后者则是对应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在东方专制国家，如俄国，政治领导权比起文化领导权来，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在西方，情形正好相反，文化领导权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他说：“在东方（如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的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sup>(12)</sup>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结构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国家活动的重要内容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领导者对作为被统治阶级的被领导者实施领导权。一个统治阶级一旦失去这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那么国家就会陷入危机状态。他说：“一个社会集团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行使‘领导权’；以后当它行使权力时，它成了统治者、但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它仍然必须继续‘领导’。”<sup>(13)</sup>（笔者注：这里的社会集团是指统治阶级）。也就是说，一个阶级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就应当首先确立起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而一旦这个阶级已经取得了政府权力并牢牢掌握这个权力时，它也还必须继续保持这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稳定，保证其阶级统治地位。葛兰西这里强调的“领导权”概念是在意识形态（包括文化、精神、道德等各方面）的意义上来

使用的,是指统治阶级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社会团体、组织,以文化、宗教、习惯、教育等为媒介,对市民社会行使一种精神上、道德上的指导,从而使被统治阶级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自发地拥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取得同意进行统治,通过更广泛的文化使其统治更为稳固。

基于以上思考,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东方,其直接目标并不是夺取国家领导权,而是先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渐破坏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然后在有可能的适当时候顺利地掌握国家权力。他据此提出了东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的著名观点。葛兰西认为,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是“运动战”,也就是面对面,直接向敌人发出进攻,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直接目的,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则是“阵地战”,就是不主动出击,而是坚守市民社会阵地并逐步扩大,以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为目标。他着重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阵地战”的革命战略。在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级不仅拥有国家的政治机器,而且牢固地掌握着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西方国家存在着成熟了的坚固的市民社会,它对维持西方国家的统治起很大作用,而国家的政治机器的作用相对较小。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基础,国家的政治机器不过是外围的壕沟,而壕沟之后的市民社会则是坚固的工地、堡垒,它能承受各种经济、甚至是政治危机的打击,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在此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就难以采取“运动战”方式取得胜利。因为即使在某种条件下以“运动战”迅速打开敌人营垒的缺口,但在发达国家中国家政权只是一条外围的壕沟,资产阶级领导权所支配的市民社会阵地依然存在,这就谈不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要从根本上动摇资产阶级统治,就必须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即取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思想观念的侵入,占领是一较为缓慢、渐进的过程,因此,革命的战略只能是一种长久的阵地战。他举例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正是资产阶级对封建意识形态采取长期文化攻势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同时也必然在精神力量上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此强调了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则强调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认为统治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也就支配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使人民在精神上自觉服从于政治统治,从而保证现有政治制度的稳固。在这里,葛兰西不是把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政治领导的工具,是统治者有意识的欺骗,被统治者受骗,而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历史观点,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客观现实,并非少数统治者的主观阴谋。这种领导权本身内在地掩盖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因此,这种深层次的欺骗具有更大的蒙蔽性,使人民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而意识不到其本质。葛兰西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分析的确是独特而深刻的。他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战略的观点也是颇有见地的,即注重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强调了革命中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了这种作用。甚至视之为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政权作为政治的核心作用,这不能不是他在哲学观上受克罗齐某些唯心主义因素影响的结果。

#### 四、国家消亡:市民社会的全面实现

葛兰西认为,国家消亡就是政治社会的消亡过程,是市民社会完全取代政治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制性因素逐渐弱小,人民的思想、文化、道德行为则日益增长。”可以设想,

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结束自己。”<sup>(14)</sup>“……国家和法律由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且即将被市民社会所吸收而成了无用的东西。”<sup>(15)</sup>葛兰西将未来的市民社会看作是以共同的道德、文化、精神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作为国家，它既需要政治机器的强制，也需要人民的同意，而一旦它完全确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不需要任何强制时，国家本身也就成为无用的东西，而它将熔化在市民社会中，那时就只剩下市民社会本身而没有政治社会，国家消亡了。马、恩说：“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为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sup>(16)</sup>这表明，国家的消亡意味着特殊的镇压职能的消失，葛兰西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正是马、恩这一观点的发挥。他们都强调了国家消亡过程中镇压职能的弱化以至最终消失，但他们关于消亡条件的分析却各不相同，马、恩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时指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过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17)</sup>这表明，国家消亡的条件是生产力极大增长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得以消灭、阶级产生和存在的一切根源被彻底铲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国家消亡的条件。马、恩对国家消亡条件的分析是全面的，既分析了经济方面的条件，也分析了精神方面的条件。葛兰西则强调了精神、思想的高度发展，而忽略了经济方面这个根本条件。他强调国家消亡意味着人们都习惯、自觉地遵守社会准则，公共社会规范将代替法律的作用。但是，他没有看到或是没有重视到正是生产力的极大增长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葛兰西在西方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他确实是把自己的理论探索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问题上。在讨论国家问题，他独树一帜提出了“市民社会”理论，并以此为红线贯穿其对国家内涵、职能、权力和消亡等问题的认识，着重突出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等因素对国家的重大影响，葛兰西对国家的这些“软件”的分析，为我们考察国家问题，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这正是其对国家学说的理论贡献所在，但是，在强调思想、文化因素的同时，他虽然注意到政治强制因素，却或多或少忽略了社会经济因素，没有从经济基础这个根本原因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使他无法全面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注：（1）《葛兰西文选》第44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4）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12页，伦敦，1971年版。

（5）葛兰西：《狱中书信》第238页，1975年伦敦版。

（6）（8）（9）葛兰西：《狱中札记》第217页、217页、22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

（7）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244页，1971年伦敦版。

（10）（11）《马、恩选集》，第5卷，第432页；第2卷，第438页。

（12）（13）（14）（15）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80页，第317页，第222页，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16）（17）《马恩选集》第3卷，第320页，第12页。